

人格认同危机与自由人格建构

顾红亮

(华东师大哲学系)

摘要: 在现代理性文化下,人格的认同出现危机,生存的意义得到一定程度的掩蔽。解决危机的实质是要使个人重新获得人格认同,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建构当代自由人格。这是一种包容了英雄化人格在内的平民化人格,包容了个性化人格在内的自由人格,包容了人格分化可能性在内的和谐人格,包容了现实人格在内的理想人格。这四重人格形象构成了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总体“骨架”,勾勒了“谁之人格”、“何种人格”的自由人格图像。它将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人格认同, 自由人格, 现代性, 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

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质的层面上,而且表现在精神气质与人格特征上。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由具有现代性人格特质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一个共同体需要一种精神气质,这个气质常常体现在人格上。缺乏自觉的人格意识和精神面貌的个体很难说是一个称职的现代性社会成员。现代性社会的实现自然包含精神生活质量与人格素质的提升。所以,不能撇开人格的现代性来谈论社会的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人格的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内在尺度。

社会进入现代时代,超验世界及其主宰者退隐了,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趋势不可扭转。神圣的东西悄然消退,感性的、情感的东西大张旗鼓地登场。海德格尔称此现代性现象为“弃神”。在此过程中,几种现代性制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当其冲的是媒体。各种媒体上充塞着流行的、时髦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话语,以舒服的、休闲的方式控制着大众,大众变成符号化的个体,享受的是同一口味的美食,穿戴着同样风格的饰品,大众的欣赏趣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其次是专业化的分工制度,这是以专家符号的形式出现,背后的支撑者是科学知识。专业化制度在造就专家的同时,也控制着现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制造着大众对科学知识及其对科学家的信任,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控制着大众。这些现代制度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格观念。用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话来说:

“人,这个所有历史发展的鼓动者、发明者和推动者,这个所有判断和决策的发出者,这个未来生活的设计者,在现实社会中却必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化个体。”这是后启蒙时代个人生存的困境。当个人变成“数量化个体”的时候,个性或人格也就隐匿了。

鲍曼(Zygmunt Bauman)分析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初看起来,大屠杀与我们所讨论的人格现代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大屠杀不是看作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看作一个文化符号的话,那么,它表征的是一种恶(或灾难性)的符号,它告诉我们:现代性(及

其制度)出了问题。上面提到的媒体、专业化制度多少带有“大屠杀”性质的符号意义。所以,作为文化符号的“大屠杀”涉及到人格的现代性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参与了“大屠杀”,也有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的人格在“大屠杀”的进行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遮蔽或消解,人格的独立性或多或少丧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惨剧?这是值得深思的关于现代性文明的弊端的问题。

“大屠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的问题,本质上,这是一个现代性文化的问题。鲍曼指出:“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这种文化强调理想生活的设计源于理性。在施行园艺工作之前,园艺者已经有一个方案。现代的“大屠杀”工程就是类似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会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何谓杂草何谓香花的界定出于理性的先验界定。

官僚制度也是这种现代园艺文化的一个实例。“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现代官僚制度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工具理性精神。现代人在园艺文化下屈从于理性设计的安排,自我或人格的自主性多少有所失落。在这样的现代性文化下,自我的认同,或者说,人格认同出现了危机。

人格认同危机的实质是意义世界的遮蔽。置身危机之中,人们有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缺乏一种框架或视界以确定他们是谁、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这是“痛苦和可怕的经验”。人们在作价值选择时常常无所适从,缺失可供参考的理想维度。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看,中国人的人格认同危机感可能比西方人更强烈,因为我们不仅面临着类似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更面临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文化记忆的丢失、当代社会文化的结构转型等地方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在价值与伦理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一个主要困境便是人格(自我)认同危机问题,或意义的掩蔽问题。

二

正是在危机中孕育着转机的可能。我认为,解决人格危机的实质是要使个人重新获得人格(自我)认同,不是将人格交付给集体秩序的认同,也不是交付给关于“上帝”的信仰体系,而是建构真正属己的自我认同:这就是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认同。从人格认同的视角来看,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应该主要围绕“谁之人格”、“何种人格”两个问题展开。“谁之人格”的问题涉及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的关系。“何种人格”的问题可以区分为实质性、形式性、过程性三个层面的问题,实质性层面的问题涉及自由人格与个性化人格的关系,形式性层面的问题牵涉人格分化和人格整合的关系,过程性层面的问题牵涉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关系,其中,实质性、形式性层面的分析是静态的,而过程性层面的分析是对自由人格的动态把握,三个层面合起来构成“何种人格”的基本内容。

第一,“谁之人格”: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是一个大众化、又绝对信任专家的时代,是一个去贵族化、又崇尚英雄的时代。王公贵族被逐出历史舞台,人人都是平民,追求平民化的人格,但是,人人又都有明星的梦想,有获取他人承认、被他人关注的欲望,追求英雄化的人格。在个人的人格欲求中,平民化人格与

英雄化人格的追求并存，两者的紧张关系由此而产生。这构成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第一个“难题”。

换一个角度看，上述紧张关系恰好辩证地内在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允诺了这两种可能性的人格。在现当代，平民所希冀的不是圣人，而是明星或成功人士，我们暂且把他们称为大众时代的英雄。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巫去魅的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新的神话。现代社会需要的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英雄，而是为大众服务的英雄，而且使每个平民都有可能变成英雄。现代性社会制度的一个功绩就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同时，现代的英雄也有可能成为平民，随着影响力的消退，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古代社会塑造的圣人人格是恒久的，是万世之楷模，具有崇高性。现当代社会的英雄是临时性的，今天还星光灿烂，明天有可能销声匿迹。一旦没有市场、没有观众，英雄就会变成普通的百姓。英雄化人格是由大众的趣味、情调、知识和思想决定的。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是，实质上，他没有自主性。在古代的思想传统里，圣人人格影响、滋润着平民；在现当代的社会语境里，大众的知识、趣味影响着英雄化人格。因此，平民化自由人格本身兼有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双重维度。两者的紧张关系恰好构成了平民化自由人格完善自身的一个基本动力。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平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在“五四”时期有人称“平民”为“国民”、在战争年代称之为“群众”、在当代称之为“大众”。这些称谓都与国家、时代、民族这些宏大主题联系着，被赋予历史叙事的特征，但多少遮蔽了一个重要思想：平民首先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是过着普通生活的个人，即是说，平民化人格中有一个个人的维度。在现当代社会，这个维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演化为平民对英雄化人格的期盼。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给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人可以取代神或天而成为意义的创制者。现代人把自己看作是创造者，以取代上帝的地位。个人几乎成为了上帝或圣人的代名词，个人可以成为世俗化的上帝即英雄，也就是说，平民即英雄。这是说英雄化人格思想有其宗教思想史上的来源。因此，个人人格的背后包含着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的双重追求。

上面所讲的英雄是世俗化的英雄，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化人格。他可能并不为众人所知，并不是大众的明星，并不被公众所赞扬。他只是坚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努力实现着独立自主的可能性理想，完善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丰富着自己的“自性”。他也追求成功，但不是世俗的成功，不是以权力、地位的显赫来衡量的成功。他追求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要求：“对发展了的生活条件的支配要成为服务于真正的个体自我的手段，要有利于那通过所有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事物才实现的生活发展。”这种英雄是精神上的英雄，人格上的英雄，也是平民化的英雄。这种英雄化的人格是真正自由的人格，也是平民化的人格。总的来说，不论个人的人格是平民化的还是英雄化的，不论“谁之人格”如何定位，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的“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认同。

三

第二，“何种人格”的实质性层面：自由人格与个性化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设的一个实质性维度是自由人格。自由人格一定是个性化的，两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有其特殊性，他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爱好、兴趣与才能。正是这些特殊性，造就人的个性。在原初的意义上，自由就是要展现这些特殊性，展现个性。被压抑的个性不是自由的个性，而是无个性；被普遍化了的个性也不是自由的个性，而是类性，因此，自由人格一定要顺着个性或特殊性发展才有可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人性“象一颗树，需要生长并且

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只有这样，人格才会是自由的。主体的自由人格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主体的特殊性要求。即是说，一个特殊的主体，才有可能拥有自由人格。平民化自由人格本身内在要求着个性化的人格。

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着个性化的自由人格与奴役性人格之间的尖锐矛盾。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现代人不断获得自由，加在人身上的各种束缚不断被除去。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当代人尽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他并未获得确定的安全感，以至于为了寻求安全而甘愿逃避自由。当代社会的发展也的确提供了这样的逃避机制，使个人又可以回到被奴役的状态，臣服于新的权威。这是现代性的悖论，也是当代人格建构的悖论：在解放人的自由、促进人的自由人格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限制人的自由，促进奴役人格或被奴役人格的发展。所以弗洛姆说，当代社会结构对人格具有双重影响：“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

在弗洛姆看来，在当代社会，逃避自由有两种心理形态或两种人格类型：一是权威主义的人格，这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比较普遍；二是机械趋同的人格，这在当代民主社会里比较盛行。在权威主义的人格类型中，个人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常常贬低自己，进而渴望臣服于外在的力量或组织，依附于某个外在的权威，以便从这个或那个权威那里获得依靠和支柱，由此获得存在的意义。机械趋同的人格带有从众的社会心理，他普遍认同社会通行的文化模式，接受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按社会期望来规整自己的行为，建塑自己的人格。在机械趋同的人格类型中，“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按弗洛姆的判断，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部分平民的人格模式。当代平民化人格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机械趋同的人格。

上述两种人格类型的共同特征是自由个性的丧失，自我的放逐。“而自我则是自由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自我的放逐意味着安全的缺位，个人处于恐惧之中。然而，当代社会的发展却是以标榜“个性”、“自我”实现为取向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形态的当代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用弗洛姆的话说，这个发展的总特征是“个人活动原则”。因此，个体化的进程是当代世界的深刻社会现象。但是，一个悖论正潜伏在这个进程的背后。这个悖论在于：一方面，个体化的进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却日益成为追逐利益的工具，“成为非自我目的的奴仆”；另一方面，个人以为他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主体自身而展开，他以为他自身是目的，不是工具，他“坚信自己是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在现代的伦理学里，自利是一个正当的动机，个人首先就是一个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个体。自利即是自爱，以自己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每个当代人都以为自己是主人，可是，实际上，他的整个生命的目的是外在的，并非属于他自己。他的人格是奴役性的人格。我们以为我们是自作主宰的，我们有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有自己的欲求与渴望，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受他人与他物控制的。“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从这个视角看，当代的平民化个性人格追求其实是一种“幻觉”。他所追求的是别人为他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自我的目标。因为就连他的“自我”、人格本身也是在别人的期许与期盼中建构起来的。当然，普通的平民并不以此为“幻觉”，反而觉得自己生活在真理之中，生活在一个个性化的社会之中。这正是当代社会中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第二个“难题”。

这个“难题”的解决之途还在于自由的个性化人格的建构，消除奴役性人格的影响。按照弗洛姆的设想，当我们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追求所谓原子式个人自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离自由人格更远了，离奴役性人格更近了。当我们在自发活动中重新回到与世界的联结关系中，生命力就会在一个完整的、愉悦的环境里重新焕发，自由人格的含义就会在创造性的生命活动

中被积极地构建。当代的平民化人格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人格：“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自发活动。”其目标是实现真正的自我，充分实现个人的潜能，使得自由人格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特殊的自我、负责自我的自我。这是当代“何种人格”建构的实质性内容。

四

第三，“何种人格”的形式性层面：人格分化与人格整合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人格认同危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人格（自我）的分化以至分裂。这构成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第三个“难题”。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人格的分化与分裂属于“何种人格”话语的形式性维度。我们可以从个人和社群两个角度分述。

从个人的角度说，多重人格趋于分裂的现象在当代越来越严重。人格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具有表演性、外在性的特点，又具有本真性、内在性的特点。在大众面前表现的是一种显性人格，具有表面化的特点，有时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自己独处或在私人交际圈里表现出隐性人格，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或许只有自己或少数几个人了解他的人格，有时候可能连他本人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格。显与隐、内在与外在的错位很容易滋生多重人格。在他人面前，表演性人格表现得比较从众，随大流，开放，乐观，尽量塑造出一个容易被大家所认同的人格形象。在面对自己或知己，本真性人格表现得比较真实，他会倾诉自己的苦恼，展示自己深层的心理，或者是阴暗的，或者是光明的。社会上出现许多贪官，他们身居要职，在大会上讲得头头是道，满嘴讲的是官样文章，什么反腐倡廉，什么为人民服务，可是在背地里，在私人场合里，干的却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干的是祸害百姓的丑事。这些人是典型的表演性人格与本真性人格分裂的当代例子。

从社群的角度说，社群所持的人格认同与个人所持的人格认同之间的裂痕在当代越来越大。一个社群有一个社群提倡的价值原则与取向，它们构成这个社群所希冀的整体人格认同，对个人的行动有引导和激励的作用。然而，每个个体往往有自己的人格认同和价值取向。在传统社群里，个体与社群的价值取向常常是一致的，发生冲突的情况比较少。中国传统家族与“天下”是价值共同体，儒家价值原则整合了人们的意志与思想。可是在当代社群中，文化、价值选择的多样化日益成为事实，人们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选择权利与人格取向，这些认同与取向很可能与社群的价值原则和集体认同相冲突，或者说不一致。

人格的分裂不同于人格的分化。分裂是危机的表现，分化则是一种常态。人格的分化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理解，例如一个人的人格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层次，如冯友兰讲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等不同的境界层次。平民化自由人格承认人格分化的事实，但试图克服分化中隐含的分裂倾向，防止由人格的分化向人格的分裂转折，进而强调自由人格是一种和谐的人格，是知情意、真善美的整合。人格的分化和人格的整合作用内在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套用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平民化自由人格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人格，既承认人格之间、人格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分化与差异，又承认差异之上的人格和谐。如果人们能够正视人格分裂的危害性，以分化与整合相统一的视角考察当代人格的认同危机，和谐的自由人格的培育就大有希望。

五

第四，“何种人格”的过程性层面：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谁之人格”的主体性规定和“何种人格”的实质性与形式性规定都是对平民化自由人格的静态描述，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剖析“何种人格”话语的过程性维度，则是把当代平民化自

由人格的建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与建构性的过程。

在当代，由于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作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几乎销蚀而尽。这种销蚀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因为理想和现实既可以在时间范畴内被理解为未来与现在，也可以在空间范畴内被理解为可能性场域与现实性场域。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的拉平，预示着未来与现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隔阂的消弭。这样，世俗化的现实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人格目标。这个目标在当代有其合理性。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个人首先是一个感性化的、现实的存在者，现实的需求和感性满足是个人生存的首要条件。这个事实反映到人格话语上，个人追求的首先自然是一种现实的人格。当代人注重的是当下的感受，看重的是今天的生活。这种人格可能有缺点，但是很真实。然而，关注人格的现实性维度的背后隐藏着当代人格认同危机中的主要问题，那就是：人格的理想维度多少有所忽视。人们满足于现实的人格，把现实人格确认为理想人格。因为理想就在当下，就在现实之中。当代人的这种人格追求与古典的人格追求恰好相反。古代儒家的圣人人格纯粹是理想人格，现实人格没有价值地位，只有比照理想人格标准才有意义。当代人认现实人格为理想人格，实质上是对理想人格的取消。这是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第四个“难题”。

从理论上讲，走出上述危机的一个途径是重新界定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视自由人格为现实人格与理想人格的辩证统一。它既指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企及的人格，又指它具有终极关怀的意味，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平民化自由人格的这一辩证品格为当代人格建构中的理想与现实脱节现象提供了支援。

在终极的意义上，平民化自由人格标识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存在的意义域。徐复观指出：“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人的精神境界就属于这种“只能由心灵去接触”的东西。它既是理想的，以一个终极性的、超越性的尺度照看与批判现实人格；它又是现实的，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和世代生成经验中可以感受到的，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可以体会到的。自由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自由人格境界的动态提升过程中，现实人格以理想人格为指向，并不断逼近理想人格，“由凡入圣”；理想人格以现实人格为落脚点，并不断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人格，“由圣入凡”，两者呈现出互动的、互相生长的辩证境况。

从过程性层面看平民化自由人格，说明人格境界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用弗洛姆的术语来说，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的，而是享用的，不是制造的，而是创造的。现成的人格境界是死的，是等待填充的道德“容器”。生成的人格境界是有生命力的，总是趋向新的可能性，开辟新的自由境域。简言之，本真生命是自由人格的表达。生命以日常生存与世代生成两种方式展开，人格境界的生成同样体现这两方面，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体现在世代生成之中，不断指向开放的可能性。

前面的分析表明，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是包容了英雄化人格在内的平民化人格，是包容了个性化人格在内的自由人格，是包容了人格分化可能性在内的和谐人格，是包容了现实人格在内的理想人格。这四重人格形象构成了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总体“骨架”，勾勒了“谁之人格”、“何种人格”的自由人格图像。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必须正视这个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它将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与典范。

参考书目：

[1]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886.

- [2] 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 张敦福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28.
- [3]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M]. 杨渝东等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24、24-25.
- [4] 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M]. 韩震等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37.
- [5] 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 [M]. 王德峰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7. 161.
- [6] 约翰·密尔. 论自由 [M]. 程崇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63.
- [7] 弗洛姆. 逃避自由 [M]. 刘林海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75、132、181、81-82、180、184、291.
- [8] 徐复观文集 (第1卷) [M]. 湖北: 人民出版社, 2002. 191.

注释:

- [1] 《海德格尔选集》(下),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第886页。
- [2] 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 张敦福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第28页。
- [3]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2, 第124页。
- [4]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2, 第24-25页。
- [5] 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韩震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1, 第37页。
- [6] 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 王德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第161页。
- [7] 约翰·密尔: 《论自由》, 程崇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第63页。
- [8]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75页。
- [9]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132页。
- [10]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181页。
- [11]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81-82页。
- [12]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180页。
- [13]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第184页。
- [14]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孙恺祥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第291页。
- [15] 《徐复观文集》第1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第191页。

The identity crisis of personality and constructure of free personality

Gu hongl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modern rational culture, identity of personality appeared crisis, and covered them meaning of lives to some extent. The substance of resolving crisis makes person regain personal identity, and a possible way is to build modern free personality. It includes heroic and common, free, harmonious and ideal personality. The four kind of personal images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common free personality, and outline whose personality and what personality. It will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pirit lives.

Keywords: identity of personality; free personality; modernity; ideal personality

收稿日期: 2007-8-2

作者简介: 顾红亮(1971-), 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